

# 中國西醫事業的奠基人 ——伯駕

李亞丁

今日孫逸仙紀念醫院的正門

2010年11月4日，廣州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慶祝175週年華誕。這所醫院橫跨三個世紀，前身是博濟醫院(最早稱為仁濟醫院)，1835年由美國第一位來華的醫療宣教士伯駕(Peter Parker, 1804-1888)所創立，是中國第一家西醫院，西方醫術從這裏開始向中國各地傳播流佈。2010年10月，廣州《羊城晚報》的電子報〈博聞周刊〉以「中國現代醫學從這裏起步」為題，詳細介紹該醫院的歷史，足證這所醫院對中國現代醫學的貢獻，而伯駕實功不可沒。

## 一、伯駕的早年生活

1804年，伯駕於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弗雷明翰(Framingham, Massachusetts)一個濃厚清教徒傳統的農家，是家中唯一的男孩，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妹妹。在父母親的言傳和身教下，一家敬虔、純樸，受到很好的信仰薰陶。因為家境並不富裕，伯駕課餘要幫忙農務。1820年4月15日，16歲的伯駕受洗成為基督徒。

1827年，伯駕進入阿默斯特學院(Amherst College)，半工讀完成了學業。三年後，考入耶魯大學(Yale College)，修讀解剖學、化學、植物學、地質學、天文學和哲學等課程，1831年9月畢業，獲得學士學位。伯駕不但勤學，也努力追求過聖潔的基督徒生活。在他的日記中，經常出現的一句話就是：我願更加聖潔、更像耶穌。1831年4月間，美部會(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，美國最早的海外宣教團體)宣教士安路福(Rufus Anderson)到耶魯校園主領聚會，伯駕作了重要的決定——獻身作宣教士。他向美部會提出申請，並獲接納，再回到耶魯接受神學和醫學的訓練。1834年3月，伯駕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和醫生的資格；5月，被美國長老會按立為牧師；6月1日在紐約長老會正式受任為宣教士，三天後即為美部會所差派，從紐約乘坐「馬禮遜號」輪船，繞道好望角前來中國，成為了美國第一位來華的醫療宣教士。

## 二、行醫宣教生涯

### 1. 開設醫局

伯駕於10月26日抵達廣州，一個多月後，轉往新加坡，在那裏學習中文(福建話)，並開始從事醫療宣教。翌年9月，伯駕再回到廣州，決定在廣州專供外國人經商的「十三行」開設醫局。在英美商人捐助下，又得到十三行總商伍秉鑒襄助，伯駕租賃了新豆欄街豐泰行的一部分開設眼科醫局，稱為「新豆欄醫局」，於11月4日開診。不久，擴大為「仁濟醫院」(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)，懷著「本耶穌基督大愛，以濟世為懷作宗旨」，伯駕擔任院長。雖然前曾有馬禮遜(Robert Morrison)、郭雷樞(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)等人在澳門辦過醫療診所，但規模都很小，並且沒有延續下來。伯駕這所醫院是中國境內第一所正規的現代化西醫院。

新豆欄醫局一開始就頗具規模，有可容百多人的候診室、40餘張病牀，儀器新穎。伯駕的專長本是眼科，因為眼病在中國極為普遍，中醫卻是最束手無策。可是，中國百姓對西醫心存疑惑，不敢前來就醫，雖然標明免費治療，開業的第一天竟無人問津。次日，一位飽受眼病折磨多年，卻又無錢求醫的婦女，抱著姑且一試的心，戰戰兢兢前來就診，從此揭開了西醫在中國治病的序幕。

### 2. 創新的制度和技術

伯駕醫術高明，和藹可親，很快便贏得廣州百姓的信任，病人的數目增多，醫局的名聲也愈發提高。根據紀錄，醫局開診後僅17天，前來求診的人數就達到240位，內中還包括好幾位衙門官員。開設後的第一年，共診治病人2,152人次，到醫院來訪問、參觀者不下數千人次。為了使日漸增多的病人能夠循序就醫、提高效率，伯駕在病人進門後，先發給竹片製成的長方形號牌，病人

就按照號牌上的號碼，循序進入診療室接受治療。據說，這種設計就成了今日各處醫院普遍採用的「掛號制度」。

伯駕在診療工作上的另一個貢獻，就是「病歷制度」。前來求診的病人大部分都由伯駕診治，人數最高曾達一天200多人。伯駕嚴格實行病歷登記制度，除病人的姓名、性別、年齡、籍貫外，對處方用藥、治療效果、手術時間長短以及取出的腫瘤或結石的大小、重量等，都有詳細的紀錄。在他的病歷記錄中，有一位13歲的小女孩，面部長有巨型腫瘤，從頭部太陽穴一直向下生長到右邊面頰，整個右眼幾乎都被遮閉掉。伯駕經過周密的準備，為這女孩進行切割手術。當時還沒有麻醉劑，只是在手術前讓女孩服用一些鴉片劑，然後將她的眼睛蒙住，把手腳綁在手術台上。伯駕成功地割下這顆一磅多重的腫瘤，成為他來華後施行的第一宗外科手術。



關喬昌所畫的伯駕診症圖(網上圖片)

此後，每次進行割治手術前後，伯駕都特別請畫家詳細繪下病人的病狀，歸入檔案，供日後教學及研究參考。當時十三行有一位華人職業畫家關喬昌(西方人稱他為Lam Qua)，曾習西洋畫，有感於伯駕的善心，自願免費為伯駕畫下各

種病狀，成為生動的病歷資料。如今尚存的有110幅，其中86幅在耶魯大學醫學院圖書館(Yale Medical Library)，23幅在倫敦蓋氏醫院的戈登博物館(Gordon Museum at Guy's Hospital)，一幅在波士頓的康特威圖書館(Countway Library)。其中有30多幅

是腫瘤患者的畫像，很多都是奇形怪狀、醜陋猙獰的病狀，看過的人皆無不敬佩伯駕的醫術與愛心。

此外，伯駕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也首創了多項紀錄，如割除扁桃腺(1836)、割除膀胱結石(1844)、使用乙醚麻醉(1847)、採用氯仿麻醉方法(1848)等等。

伯駕初設醫局時，主要是治療眼病，後來因應需求，已增加診治其他病症。鴉片戰爭後，仁濟醫院復業，成為一所綜合性醫院。

### 3. 仁心仁術為傳福音

伯駕診治過的病人超過5萬之眾，其中上至兩廣總督耆英，下到渾身長滿疥瘡的乞丐，他都一視同仁，秉承耶穌基督的大愛，細心救治。在他所挽救的許多生命中，包括第一位華人牧師梁發，伯駕曾說：「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過其它善工，只恢復了這個為上帝所愛的僕人的健康，我也就不枉為人一世了。」(《梁發傳》，香港：輔僑出版社，第88頁)。後來，梁發常到仁濟醫院向病人傳福音，也為伯駕分擔勞苦。

每天，伯駕清早起牀，簡單就餐後，就看病治療，往往直至深夜，作息並無規律。但當他看到一個個病人經他治愈後離去，就心裏快慰，感到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。他的服務體現了耶穌基督的博愛，以行動見證了基督的福音。伯駕一直視醫療為傳揚福音的途徑，每次為病人施行手術前，他都迫切地為病人禱告，幫助病人信靠神，將他們交在最大的醫生——耶穌手中，然後才進行手術。當痊愈後，再與病人一起禱告感謝神，藉此使患者不但得到身體康復，更經歷到心靈的更新。後來，醫院也附設有禮拜堂。

### 4. 推動醫療宣教

鴉片戰爭(1840-42年)爆發後，仁濟醫院被迫停業。伯駕遂周遊美國、歐陸、英格蘭及蘇格蘭

等地，推動醫療宣教，招募醫療宣教士及募集宣教經費，同時也引進最新的醫學技術。1838年2月21日，美國第一位來華的宣教士裨治文(Elijah Coleman Bridgman)、郭雷樞和伯駕，以及商界人士在廣州聯合成立了「中國醫藥傳道會」(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)，郭雷樞被推為主席，伯駕為副會長。不久，郭雷樞回英國長居，伯駕就成為實際的負責人。該醫藥會在聯繫早期醫療宣教士方面發揮了很大的功能。1839年時，在華宣教士中只有兩位屬醫療宣教士，因為伯駕的推動，1842年後有更多的醫療宣教士來華。50年後，已有61家醫院、44家藥房、100多位男醫生和26位女醫生在華從事醫療宣教，許多華人也因他們的愛心醫治而接受基督教信仰。

### 5. 培育後繼人材

由於仁濟醫院聲名遠播，不少外地患者也前來求診，醫院門庭若市。為解決人手不足問題，伯駕於1837年招收了3名華人青年，以師徒的形式傳授西方醫術，首開中國人師從西人學習西醫的先河。其中最有成就是關韜，就是為伯駕繪畫病歷的畫師關喬昌的侄子。關韜約於1838年跟隨伯駕學習，由於天性聰穎，且好學不倦，數年後即能獨立施行常見的眼疾手術，以及拔牙、治療脫臼、骨折等工作。伯駕深慶有此學生，每逢休假，就委任關韜代為主持診療工作。

1855年，仁濟醫院由美北長老會宣教士嘉約翰(John Kerr)醫生接手管理，1859年遷入新址，改名為「博濟醫院」(Canton Hospital, Pok Tsai)。1866年在院內開設中國第一間西醫學校「博濟醫學堂」。孫中山先生也曾於1886年秋天進入該學堂，一年後才轉往香港「西醫書院」(香港大學醫學院前身)攻讀，故博濟醫院後改稱為「孫逸仙紀念醫院」。



### 三、伯駕與鴉片戰爭

伯駕來華未幾，中英即發生鴉片輸入問題。1839年初，清廷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南來廣州，查禁鴉片。英國鴉片商不甘盡數交出鴉片，敷衍了事。林則徐遂派兵包圍「夷館」（外國領使館），當時被困的外國人有300多名。經過一番對抗，英商陸續繳清鴉片，英僑全部撤至香港和澳門。清政府與西方列國的關係日趨緊張，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，至1842年清廷戰敗，簽訂《南京條約》割地賠款才結束。

當英僑撤離之際，伯駕仍留在廣州，醫院照樣開診，求診者為數仍眾，連林則徐也有請他開藥方為鴉片煙客戒毒。戰爭爆發後，伯駕才不得不關閉醫院，前往澳門。

伯駕除為林則徐提供鴉片危害性命的詳實資料，還曾為林搜集海外資料，幫助翻譯書報。《萬國律例》(Law of Nations)的片段中譯，就是伯駕所作。這些資料幫助林則徐等開明官員瞭解世界和西方文明，及進行外交與戰爭決策起了一定的作用。此外，伯駕還曾贈予林則徐一份地圖、一本地理書和一個地球儀。1839年7月，伯駕給林則徐寫了一封信，詳細闡述了他對中英局勢的看法，並對林氏的禁煙立場，及中國人民所受鴉片荼毒之苦，深表理解與同情。

### 四、政治與外交生涯

仁濟醫院在鴉片戰爭中被民眾燒毀。戰爭結束後，伯駕一面復辦醫院，一面從事外交活動。1844年，中美在澳門望廈村從事《望廈條約》談判時，伯駕應聘擔任美國公使顧盛(Caleb Cushing)的秘書兼中文翻譯。由於伯駕精通中文，熟悉中國情況，又通過行醫與中國官員結交，對他的談判工作帶來許多便利，而且這次談判的對手就是曾向他求醫



昔日博濟醫院的石柱今存放在院史館內

的兩廣總督耆英。原來《南京條約》中對傳教問題並沒有作出任何規定，這次經伯駕等人力爭，《望廈條約》加進了在華傳教自由之條款，對清政府採取基督教政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。特別是他與十三行巨商潘仕成等中方顧問的密切交往，促成了傳教條

款的訂立和條約的簽訂。

由於伯駕牽涉了太多美國的政治和外交事務，引起美部會的不滿，認為他忽略了宣教工作，於1845年被迫辭職，美部會也終止了他的宣教士資格。同年，伯駕接受美國泰勒(John Tyler)總統的聘任，成為美國駐華外交代辦；翌年，美國政府正式委任他為駐華全權公使。

### 五、晚年生活與家庭

1857年4月22日，伯駕結束了他在中國的宣教和外交生涯，偕妻子回到華盛頓特區定居，從此脫離美國政界，沒有再來中國，也沒有再行醫。不過他對中國的關注卻從未中斷，繼續與中國的友人保持聯繫。當他得知博濟醫院在嘉約翰的領導下，在醫療宣教方面不斷取得進展時，心裏感到無比的快慰。1885年博濟醫院為紀念伯駕開設醫療事業50週年時，他還寫信祝賀哩！

1859年，伯駕與美部會修好，並成為該差會的理事。1876年，伯駕在美擔任「中國醫藥傳道會」會長，同時也擔任美國國立博物館(Smithsonian In-

stitution)參議以及耶魯大學校友會會長，並熱心於新成立的福音派聯盟，也撰寫了數本醫療宣教的書籍。

在家庭方面，1841年3月，伯駕37歲，與美國國務卿Daniel Webster的姪女Harriet Webster結婚。鴉片戰爭結束後，夫婦同返廣州，伯駕夫人成為第一位居留廣州的美國婦女。兩人婚後多年仍膝下猶虛，直至返美兩年後，喜得一名兒子，是年伯駕已55歲。

伯駕在美國度過他的晚年，1888年在寓所中去世，享年84歲。他是近代中美關係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，從他在華23載的經歷，看見了中西方文化、政治與軍事激烈衝突的縮影。

#### 資料來源：

李亞丁主筆《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》，見www.bdcconline.net

Gulik, Edward V., *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*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3.

Bowers, John Z., M.D., *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*, USA: Tiosak Macy, Tr. Foundation, 1972.

金曾澄著《中山紀念博濟醫院概況》，1934年3月。

魏外揚著《中國教會的使徒行傳》，台北：宇宙光，2006年。

顏宜威著〈伯駕在新加坡的醫療活動與早期教會醫院的建立動因〉刊《中國科技史雜誌》第34卷第2期(2013)，第159-172頁。(網上下載日期：2014年8月4日)

(作者為教會歷史學者，現居北美，從事寫作、教學與宣道)